

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崔心悦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青年群体的社会信任不仅影响其个人身心的发展，还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在鼓励培养高素质人才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之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研究（CGSS）2021年数据，以社会信任程度为因变量，互联网使用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和与邻居的互动频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的部分人际关系和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青年群体；社会信任；互联网

DOI:10.12417/3041-0630.25.24.033

1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在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在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以及功能方面区别明显，其便捷性显著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率。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熟人社会”，个体与所处差序格局中的亲友、邻居、熟人等的关系也可能受到互联网的影响，这种与亲友、邻居间的特殊信任又会影响到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

本研究以青年人中心，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社会信任的影响，探究其影响路径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影响青年人与亲友、邻居的关系？第二，互联网使用是否通过对青年人特殊信任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本研究希望能够为青年群体更好地进行社会化，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等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2 文献综述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之一，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根据互动论视角下的定义，信任是对他人行为的期待。Durlauf把个体间的信任分为个人化信任和一般化信任，前者是来自反复多次的人际交往的信任，后者也称社会信任，是基于对象群体的构成、动机、教养等一般性知识产生的信任，即对陌生人或者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本文主要探讨一般化信任，即社会信任。

随着互联网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赵晓航和李建新（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对其社会信任水平有负面影响，可能加速了负面消息的传播。叶韦明和高经纬（2019）发现，教育年限对互联网使用造成的社会信任负面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甚

至能完全消除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削弱作用。赵建国和王嘉箐（2021）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种负面影响，但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收入、受教育年限、社会阶层预期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负面影响。这说明使用互联网对社会信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以调节的。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正面影响。栾绍娇（2017）通过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互联网使用的时间越长、使用的频率越高，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冯首伟（2018）经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部分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正面影响，尤其是对一般化信任的影响更加显著。学者们大多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正面影响，而且一些个人因素也对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互联网对社会信任转型方面的重要作用，试图通过规范互联网的使用来提高社会信任程度。张加春（2016）提出了嵌入性信任的概念，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形成了融合熟人关系网络与陌生人关系网络的新型信任关系结构，即嵌入性信任，并强调信任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姚少宝（2022）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网络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使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仅加速了社会信任的转型，而且还影响了社会信任的形成机制。

综合以上文献，学者们从多种学科角度对互联网和社会信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且证实了互联网对于社会信任的正面影响，以及个人因素对互联网负面影响的抑制作用。其中涉及的影响因素主要围绕个人特质。在研究互联网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时，还需注意到中国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形态。费孝通认为“差序格局”是一种因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有差别对待的行为模式，强调的是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信任模式延续至今，并在互联网这一

时代科技的背景下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信任。

3 研究假设

朱秋锦等（2021）提炼人际交往中影响信任的因素，探索亲疏关系等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发现亲疏关系可以对人际信任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虽然当下社会正在进行剧烈的转型，但中国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依旧延续下来，并且影响到信任的建立。个人与靠近中心的社会关系越亲密，才越有向外建立其他关系的能力，越有信任陌生人的基础。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 1a：与亲人亲密程度越高，青少年社会信任程度越高。

假设 1b：与邻居的互动频率越高，青少年社会信任程度越高。

互联网的出现消除了时空差异，其较低的准入门槛使得人人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开展关系交往。因此，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人们的交往是增多的。栗洪伟（2022）等人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个体与亲人的关系影响，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增强亲人关系密切程度。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 2a：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与亲人的亲密程度越高。

假设 2b：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与邻居的互动频率越高。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前受时间、空间等因素限制的关系得以发展。栾绍娇（2017）、冯首伟（2018）等人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 3：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社会信任程度越高。

4 数据来源、变量描述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2021 年调查数据。基于研究主题，本文剔除了数据库中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如在“社会信任”、“互联网使用”等问题中拒绝回答、回答“不知道”和缺失的样本。世界卫生组织在年龄分段中将 15-24 岁的人群界定为青年，因此，本文选取数据中 15-24 岁范围内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得到 223 个有效观测值。

4.2 变量描述

4.2.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青少年社会信任水平，选取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一问题来衡量社会信任水平。被访者的回答包括“非

常不信任”、“不信任”、“一般”、“信任”和“非常信任”5 个选项，依次赋值为 1-5。

4.2.2 自变量

自变量是互联网使用频率、和邻居互动的频率、和亲人的亲密程度。本文选取问卷中“过去一年，你对以下媒体使用情况是？”这一问题中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使用的回答来定义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依次赋值为 1-5，数值越高，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问卷中“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用于衡量和邻居互动的频率。为了便于研究，将 7 个选项“几乎每天”、“一周 1 到 2 次”、“一个月几次”、“大约一个月 1 次”、“一年几次一年 1 次或更少”、“从来不一”反向赋值为 1-7，即数值越高，互动频率越高。“您对‘和家人在一起，我感到特别愉快’观点的同意度”用于衡量和亲人的亲密程度，“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6 个选项依次赋值为 1-6。数值越高，和亲人的亲密程度越高。

5 统计结果

5.1 关系亲密程度对社会信任的回归分析

与亲人的亲密程度、与邻居的互动频率为 2 个自变量，社会信任程度为因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与亲人的亲密程度、与邻居的互动频率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其中与邻居的互动频率的显著性水平小于 0.01，与亲人的亲密程度显著性小于 0.1。与亲人的亲密程度、与邻居的互动频率对社会信任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知，青年人与家人的关系越亲密，与邻居的联系频率越高，越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

表 1

变量	系数
与邻居的互动频率	0.195***
与亲人的亲密程度	0.120*
R ²	0.055
调整后的 R ²	0.047
F	6.462***

*p<0.1;**p<0.05;***p<0.01

5.2 互联网使用对关系互动频率的回归分析

互联网使用对关系互动频率的影响采用一元线性回归。设置模型 2、模型 3 两个回归模型。两个模型的自变量均为互联网的使用频率。模型 2 的因变量为与亲人的亲密程度，模型 3 的因变量为与邻居的互动频率。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2 的标准化系数为 0.03，显著性水平小于 0.1。由此可知，青年人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影响较小。模型 3 标准化回归系数为负数，显著性水平小于 0.01。由此可知，互联网使用对于邻居的互动频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青少年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与邻居的互动频率越低。

表 2

	模型 2	模型 3
	与亲人的亲密程度	与邻居的互动频率
互联网使用频率	0.03*	-.110***
R ²	0.012	0.012
调整后的 R ²	0.004	0.011
F	0.003*	8.189***

5.3 互联网使用频率与社会信任程度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具有 3 个前提条件。一是自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路径 a），二是中介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路径 b）；三是自变量和因变量显著的相关性在同时控制路径 a 和 b 后，相关性不再显著。

- (1)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与邻居互动的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的影响。
- (2) 单独考察与邻居的互动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对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
- (3) 单独考察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程度的影响。
- (4) 考察控制与邻居互动的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表 3

	社会信任			与邻居	与亲人
互联网使	0.021*		0.028	-.110***	0.03*

用频率					
与邻居的互动频率		0.195***	0.196***		
与亲人的亲密程度		0.120*	0.120*		
R ²	0.0004	0.055	0.056	0.012	0.012
F	0.28*	6.462***	4.351***	8.189***	0.03*

如果仅考虑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其标准化系数为 0.021，显著性水平在 0.1 以下，说明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社会信任水平。将与邻居互动的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和互联网使用频率都纳入模型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不再具有显著性，与邻居的互动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基本不变，纳入模型后二者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196、0.120。这说明与邻居互动的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换言之，互联网使用频率需要在个人化的特殊信任基础上才能够对一般化信任即社会信任程度产生影响。

6 结论与不足

第一，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和与邻居的互动频率显著影响青年的社会信任程度，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1。中国“差序格局”式的信任依旧延续了下来，并且对青年人的社会信任具有正向影响，血缘和地缘仍是影响青年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家人与邻居本就在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青年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是顺利社会化的表现之一。第二，互联网使用对青年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2a。而互联网对青年与邻居的互动频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推翻了本研究的假设 2b。第三，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社会信任水平，与邻居互动的频率、与亲人的亲密程度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3。

本研究在得出结论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分析互联网的使用对青少年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时，只关注了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而没有将互联网使用内容纳入研究的范围。在“与邻居的互动频率”这一变量中，只考虑了与邻居线下的社交娱乐活动，而没有将与邻居的线上互动纳入范围。因此，研究还需要与邻居线上互动的数据，促使数据分析更加全面、深入。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
- [2] 朱秋锦;张帆;钟年.亲亲为大,亲贤仍重:亲疏关系、人情取向对人际信任的影响[J].心理科学,2021,44(06):1461-1468.
- [3] 栗洪伟.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家庭关系——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J].企业经济,2022,41(06):101-114.
- [4] 赵晓航;李建新.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基于 CGSS2013 数据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2017,(01):19-27+94.
- [5] 赵建国;王嘉箐.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21,(05):119-129.
- [6] 张加春.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J].中州学刊,2016,(06):162-167.
- [7] 叶韦明;高经纬.教育使我们更信任——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分析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9,134-149.
- [8] 姚少宝.系统论视角下网络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 CGSS2017 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2,8(14):30-33+54.
- [9] 栾绍娇.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 CGSS 2013 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市场,2017,(28):28-29.
- [10] 冯首伟.互联网的使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 CGSS2013 数据的实证研究[C].浙江师范大学,2018.